

巴金

与现代出版



孙 晶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巴金与现代出版

孙 晶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金与现代出版/孙晶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

(巴金研究丛书)

ISBN 978-7-309-08471-9

I. 巴… II. 孙… III. ①巴金(1904~2005)-人物研究②出版事业-文化史-中国-现代 IV. ①K825.6②G23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6486 号

巴金与现代出版

孙 晶 著

责任编辑/陈 军 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8 字数 251 千

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471-9/G·1026

定价: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巴金与现代出版

巴金研究丛书

策划：巴金故居 巴金研究会

顾问：李小林

主编：陈思和 周立民

编委：孙 晶 李 辉 李存光 李国焯
陈子善 陈思和 周立民 臧建民

目 录

上编 巴金的编辑经历与编辑思想

绪论	3
《文学季刊》与《文季月刊》时代的巴金	23
一、《文学季刊》与《水星》	23
二、《文季月刊》	29
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	33
一、《文学丛刊》	33
二、《文化生活丛刊》与《译文丛书》	61
抗战时期巴金的出版活动	118
一、《文丛》与《呐喊》(《烽火》)	118
二、《烽火小丛书》、《烽火文丛》与《呐喊小丛书》、《呐喊文丛》	122
三、《现代长篇小说丛刊》、《文季丛书》与《文学小丛书》	129
巴金与《收获》	146

中编 巴金的编辑活动与现代作家关系研究

巴金与鲁迅	157
巴金与曹禺	168
巴金与靳以	175

巴金与李健吾	180
巴金与何其芳	186
巴金与陆蠡	195
巴金与九叶派及其他青年作家	203

下编 巴金出版活动史料

巴金重要的编辑经历与编辑活动编年	213
巴金撰写的重要发刊词、图书广告	220
巴金编辑的重要图书作品目录	240
巴金参与编辑的重要期刊目录索引	256
结语	271
后记	276



上编 巴金的编辑经历与编辑思想



绪 论

与巴金相知甚深的作家萧乾说过,“谈巴金而不谈他惨淡经营的文学出版事业,那是极不完整的。如果编巴金的‘言行录’,那十四卷以及他以后写的作品,是他的‘言’,他主持的文学出版工作则是他主要的‘行’。因为巴金是这样一位作家:他不仅自己写、自己译,也要促使别人写和译,而且为了给旁人创造写、译的机会和便利,他可以少写,甚至不写。”^①

从现代文学史上看,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意义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职业型编辑,另一种是理想型编辑。职业型编辑,他们为人正直,知识渊博,善于发现真正的人才,并乐意竭尽全力去帮助他和造就他。他们的成就感在于编出一本本被人世代传读的好书。而理想型编辑则是特殊的编辑人才,他们有自己的文学理想和文学主张,往往本人就是杰出的理论家和文学家,他们希望通过编辑出版工作来传播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这一种编辑还兼有导师的责任,

^① 萧乾:《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文汇报》1982年第2期。

他们的成就感不仅仅在于一本书的出版,而在于更大的精神力量作用。以启蒙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出版史上,光彩夺目的优秀编辑多半是属于后一类,如编《新青年》的陈独秀,编《小说月报》的沈雁冰,编《生活》的邹韬奋。主政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应该也算在这一行列。但其中也有一些区别。巴金与别人不同的是,他将他个人的信仰和理想贯穿在自己的工作精神之上,却很少贯穿在所编辑的图书之中。他很少以个人的思想和理论来框架图书出版,这就使他避免了导师的职责,而成为一个既有强烈的个人精神追求,又能做到百川归海、有容乃大的编辑。所以说,也许从纯粹的意义上看,巴金更具备一个优秀编辑的素质。

巴金早年是个安那其主义者,他曾从事安那其主义运动甚力。那一时期的编辑活动,自然与他的主义宣传分不开,是他的社会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当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失败后,巴金从国外回来,感到前途渺茫,不得不用笔写作,倾诉自己的苦闷与反抗情绪。在创作中,他不断地呼吁人们起来反抗现实社会的专政体制,而当人们读了他的作品走向现实的革命时,他自己却依然彷徨在寻求的苦恼当中。他找到了作家这种新的社会身份来寄托他的理想,可是与他早年从事的编辑事业一样,他只是把写作视为他的社会政治活动的延续,完全忽略了其作为艺术的独立价值所在。所以他写得越多,他越是感到痛苦,感到矛盾,别人称赞他的小说,反倒使他深深陷于不被理解的抑郁之中。——这是巴金在从事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工作之前的精神状态,这种飘忽不定的生活方式和寻求出路不得的心态始终成为他的苦恼之源。

一九二九年之后,当巴金自以为了解了安那其的原理,并且能深入浅出地解释它们时,他又陷入了新的苦闷。那是因为他看来,凡是一个主义者,思想、言论、行动三者必须一致。对于主义,只是想想、谈谈而不见诸行动,或者行动和思想、言论相反,绝不能认作一个主义者。他觉得自己就是这样,有安那其主义的思想,行动上却干别的事,写小说去了。于是他不断地“忏悔”,他用沉默来传递自己的困惑。

一九三四年里他几乎有半年不曾提笔,而是到一些昔日的同志、朋友那里去旅行,寻找自己适合的岗位。这段时间巴金先后去了江苏南京、浙江的台州

和长兴煤矿,去了山东青岛,还曾三次南下福建,一次还去了广东、香港,他也曾三次北上平津。其中尤以三访泉州留下的印象最深。

三十年代初期的福建泉州和广东新会等地,一度曾是年轻的安那其主义者们的活动中心。这些年轻人在海外侨胞的捐赠支持下,创办了两所中学。平民中学设在文庙(孔庙)的旧址;设在武庙(关帝庙)的是黎明高级中学。巴金的新老朋友吴克刚^①、卫惠林、陈范予^②、叶非英^③、郭安仁^④、陆蠡^⑤等都先后在这里工作过。他们的口号是“坦白”,他们的目标是“群”,是“事业”。他们创造了一个环境干净、空气清新的理想社会。

巴金十分留恋这里,他说,在这里充满着殉道者的典型,他们用工作征服疾病,用信仰克服困难。他崇敬他们。他本来应该留在他们中间,做一个建设理想社会的小小基石。朋友们也劝他放弃文人的生活。但是他好像有着两个“自己”,另一个“自己”鼓舞他在文学上消磨生命,把他从这里拉开了。回到上海,他被那许多执著于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充满献身精神的朋友深深感动,于是便写下了小说《爱情的三部曲》。写完全书,巴金感到了欣慰,但同时更感到了失落。他认为自己与那些朋友不同,他依旧是一个旁观者,他渴望做更多的事来实现生命的开花结果。

就在这时,巴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终于到来了。

一九三五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成立,根本上改变了巴金的生活状况和心理

① 巴金赴法时,吴克刚已在法国,常来往。他也是巴金作品中提到的波兰流亡革命者亚丽安娜的朋友,30年代曾任泉州黎明高中的校长。

② 陈范予(1901—1941),浙江诸暨人,1930年,赴福建泉州,在黎明高中执教,1931年秋任平明中学校长。1932年冬接受教育家匡互生的邀请,任上海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主任,其在农村教育科的实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

③ 叶非英,曾是泉州黎明高中的数学教员,后又主持泉州平明中学的工作。解放后加入了民盟,仍教数学,生活崇尚节俭。后来被打成右派,在服劳役中死去。

④ 即丽尼(1909—1968),20年代末期,在福建相继担任过《泉报》副刊编辑、晋江黎明高中英语教员等职。翻译有高尔基、纪德等的多部作品。同时,丽尼也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始人之一。1950年后,曾担任多家出版社及杂志社编辑之职,1965年调广州暨南大学任中文系教授,直至病逝。

⑤ 陆蠡(1908—1942?),下文有专节介绍。

状态。他出任总编辑后,对政治的热情完全转换成一种新的实践兴趣^①。如果说,写作仅仅是他政治社会理想不自觉的宣泄,被他视为社会政治活动的延续;与靳以等已经开始的编辑活动使他的热情有所寄托;那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工作则成了他完成知识分子自我转型的新岗位。

这取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性质。文化生活出版社不同于一般商业性质的出版机构,也不是某种政治团体的出版机构,它是一个安那其主义社会理想的实验机构。出版社的主要成员都不曾将它视为盈利途径和宣传途径,而是以义务工作的方式来体现安那其主义的互助和奉献精神。在这里,政治激情转换为伦理激情,传统的庙堂政治价值转换为民间的文化工作价值取向。出版社没有通常意义的劳资关系,其成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把自己奉献于社会和文化。这种实验与当时福建泉州、广东西江的安那其主义者从事教育的实验一样,充满了崇高的理想色彩和献身精神。安那其主义本来是一种以伦理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思潮,当它在现实政治方面的功利色彩褪除以后,即还原为伦理的本相,从道德上来约束自己和砥砺自己,进而使整个民族的道德素质有所提高。

安那其主义大师克鲁泡特金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回国,起先想参与革命实践,当他发现自己处在革命暴力的国度里无所作为的时候,就隐居起来,埋头写他的《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像巴金这样一批年轻的安那其主义者,所受克氏影响极大,当他们在险恶的现实政治环境以外找到了一个可以在伦理上奉献自我的工作岗位时,他们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了。他们

① 文化生活出版社最初发起人是吴朗西与伍禅,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直接动因是由于他们的朋友丽尼翻译了一本纪德的名作《田园交响乐》,想找一家书店出版,却因一般的书店出版社都争着出销量大、周转快的刊物杂志,不愿意出版单行本而四处碰壁。吴朗西便和伍禅、丽尼几人商量一起来办一个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5月正式创建,其时社名为“文化生活社”,9月改称“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化生活丛刊》始创时,巴金并不在国内。但由于吴朗西等认为“巴金在当时已是拥有广大读者的有名作家,他有搞编辑工作的经验,他做事认真、负责”,便邀请巴金回国主编《文化生活丛刊》。巴金欣然接受了邀请,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总编辑生涯。

在文化出版上找到了自己的岗位。由于其政治理论及时转换为伦理上的工作精神,所以巴金所编辑的出版物并不受其政治信仰的影响。尽管也有一些宣传安那其主义的书籍(如以平明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克鲁泡特金全集》)和含有安那其主义精神的书籍(如《文化生活丛刊》),但其大体上则是受到出版事业一般规律的制约,以文学创作为主题,以中外文学名著为对象,也正源于此才为三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而在这样一种出版价值观念的鼓励下,巴金的内心不再因找不到政治出路而烦躁不安,他从编辑出版工作中看到了类似于政治理想的价值所在:正义、互助、奉献自己,在转换一个价值体系后全部得以实现。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中,巴金找到了一个最有效奉献自己的民间岗位,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场所。对他来说,“出版、编辑,都是他驾轻就熟的老本行,又是与他所从事的写作联系在一起,他在这冲突的两端之间找到了一条合适自己行走的道路。”^①这时期他的创作数量明显地少了下来,但不再宣传那消失了的政治信仰,反倒更加注意了人性的魅力和艺术的魅力,而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编辑出版工作,从中感受他的价值意义。这时,他将原有政治理想转换成一种工作精神,进而去建构新的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系统。

这样,巴金从事编辑的意义便与其他杰出的文学编辑们区别开来了。其他的杰出编辑,如陈独秀编《新青年》,就是为宣传他的启蒙理想,唤起整个国民的伦理觉醒;又如胡风编《七月》和《希望》,是为了贯彻他的文学理论主张,在文坛上凝聚起一股新的力量。而巴金从事编辑却没有仅仅局限在他的安那其主义政治理想之上,而是将政治理想转换为工作精神,去建构新的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系统。作为一个文学编辑,从文学的意义上,他坚持出版优秀的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来抗衡当时污浊的文化空气;从出版意义上他从事平凡的文化积累工作,坚持用好书来抗衡险恶的现实环境。

① 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

对于自己的编辑生涯,巴金谦虚地说:“至于编书,只是因为别人不肯做我才做。”^①巴金在编辑的工作实践中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精神播火者的意义,在行动中体会到了这是一件同样值得为之长期奋斗的创造工程。他沉浸在释放自我燃烧自我的兴奋与快乐中,融入了默默垦植与建树的生活中。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我们谈理想,是要努力地把理想变成现实;我们要为理想脚踏实地做事。”^②他不再彷徨,不再动摇,不再痛苦地挣扎,他在编辑的工作中实践着自己人生的理想。

巴金曾说:“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做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这不是我自我吹嘘,十几年中间经过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几百种书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作为一个民族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奋斗的文献,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谁也抹杀不了的。这说明即使像我这样不够格的编辑,只要去掉私心,也可以作出好事。那么即使终生默默无闻,坚守着编辑的岗位认真地工作,有一天也会看到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③这“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来自法国居友的学说,也正是安那其主义社会的伦理学基础之一,由此可以见出,巴金是怎样将信仰伦理化,并与具体的编辑工作无缝地结合起来了。

理解了编辑工作在巴金人生道路上的意义,才能进一步理解他的编辑思想及其特点。由于巴金将他的政治信仰转化为工作精神,使他主持的编辑出版工作超越了一般职业编辑的意义,形成了中国文坛一股虎虎有生气的新生力量;又因为他没有将政治理想贯穿到具体的编辑工作中去,而使编辑工作能够成为一种较纯粹的文字工作。巴金不是个理论家,对文学理论也没有兴趣。这对一个文学编辑来说倒不是坏事,他对图书的选择标准更多的是取自于潜在的艺术本能。巴金本来就是个艺术感觉敏锐的作家,几乎是无师自通地走上写作道路,而且一举成名,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语言艺术天赋。但长期的政治热情使他在理智上遮蔽了对

① 巴金:《怀念胡风》,《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37页。

② 田一文:《我忆巴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③ 巴金:《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415页。

艺术的关注,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自己的创作成就不屑一顾,而且故意贬低艺术技巧的作用。但是一进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出版领域,他的政治意识就自觉地退避三舍,而艺术感觉明显地占了上风。这表现在他主编的大型丛书《文学丛刊》中。这是三十至四十年代一套极其重要的文学丛书,在战争的磨难和文化萧条的岁月里,它几乎独立支撑了纯文学的创作,推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有了这套丛书,才使许多中国作家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字。巴金为这套丛书定下的编辑宗旨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这样的自信恰恰来自他对艺术的自信。

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派系林立,除了南京官方提倡的三民主义或者“以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文学运动外,主要还有以北京周作人为代表的崇尚闲适、幽默的小品文创作一派(其影响流及上海的还有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在上海则有以鲁迅为代表的批判现实社会的左翼文学一派;从《小说月报》到《文学》的文学研究会一派;以《新月》为中心的现代诗歌运动一派,等等。每一派都有自己的文学主张与追求,形成了群雄逐鹿的文学局面。但主要影响不出于官方派以及周氏兄弟为代表的三大思潮。不久,鲁迅与一些左翼作家的观念发生碰撞,在上海团结了一批新生的文学力量自成一派,这新生一派就包含了许多不介入上述格局的文学编辑和文学青年。当时上海经济发达,俨然为出版中心,各家报纸都在上海发展,文学方面有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以及后来的《中流》,萧乾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鲁迅和黄源主编的《译文》,孟十还主编的《作家》,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及赵家璧任职的良友图书公司。这一批出版人都聚集在鲁迅的身边,成为上海文坛的新兴力量。

而在上述这些刊物发表文章的作家,是一批较年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追随鲁迅的左翼文学青年,前者主要分散在北京的几所高校里,有的当教师,有的还是学生,他们生活在相对宁静的北方,离海派文学纠纷较少,比较注重高雅朴素的艺术趣味和西方现代文学意识,可惜的是,北京出版力量微弱,他们的创作多带有自娱性质,局限于小范围的沙龙或读诗会上,这自然不利于京派文学

的发展。直到一九三三年底,如萧乾所说:“巴金和郑振铎的北来,打破了那时存在过的京、海二派的畛域。一时,北平青年的文章在上海的报刊上出现了,而上海的作家也支援起北方的同行”^①。萧乾所说的具体所指,有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等杂志,巴金参与编辑并推荐发表了年轻剧作家曹禺的《雷雨》。这一编辑思想一以贯之地延续下来,不仅《文学季刊》中有所展示,在巴金社主编的《文学丛刊》等丛书里更是有所体现。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的出版,使京、沪两地的文学青年发生了直接的沟通,形成了新的文学阵营。

四十年代,文学在战争、政治和经济的三重压迫之下进入了极其困难的时期,战争要求作家用文艺直接为抗战服务,专制体制下的政治高压又严重地束缚了作家的言论自由,而作家贫困的经济状态又给文学带来了雪上加霜的威胁。政治的冲突使文学充满政治斗争色彩,如郭沫若借古讽今的历史剧创作就是代表之一。所以当时的出版物弥漫了浮躁和粗糙的风气。唯独巴金主持的《文学丛刊》,依然从容不迫、踏踏实实地推出一批批艺术质量上乘的好书。他敏感地将目光转移到西南联大的校园里,注意到一批别有特色的文学青年,他们就是青年小说家汪曾祺和后来被称为“九叶派”的青年诗人。

三十年代是个无名的文学时代,文坛显得自由纷纭而缺乏主流。四十年代因为战争而形成了以抗战为主调的共名文学。这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时代。但巴金的编辑风格则是一致的,他超然于文坛纠纷之外,也摆脱了共名主潮的制约,唯强调艺术质量,十几年来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不低的艺术水准。这就是《文学丛刊》等丛书的使命,也是它们于万难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奉献。当然这不能说巴金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他本人的文学观具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与注重艺术的京派作家有着分歧,三十年代他为此与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等人有过争论。但一旦进入编辑工作,他又放弃了个人的好恶,不但把京派的创作推荐给读者,还发表了他们与自己相左的意见。如沈从文是位注重艺术的作家,他曾写信批评巴金“看书多,看事少”,是“感情的浪费”。巴金不服,写了文章与他争辩。后来巴金根

① 萧乾:《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文汇报》1982年第1期。